

台州百匠探奇 33

玉环茶堂街31号,一家20平方米的小店铺,张文龙的民乐琴行就“扎根”在这里。刚踏入小巷,一阵悠扬的二胡曲便提前“迎客”,走近一看,张文龙正在测试客户刚送来的旧二胡,一拉一听就测出了它的“毛病”。“放心交给我吧,过两天你来取琴,保证跟新的一样。”张文龙说道。

这是玉环一家可以修理民乐器的琴行,张文龙就是在这里“螺壳里做道场”,把爱好做成了事业。

今年55岁的张文龙,没接受过正规的乐器培训,甚至从未进过学校念书,仅凭着对民乐器的一腔热爱,经过30多年的琢磨和沉淀,成了玉环乃至周边地区有名的修琴匠。不管多破旧的乐器,到他手里都能“满血复活”。

就地取材 穷小子自制二胡

时隔近40年,张文龙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把二胡是怎样来的。

张文龙出生于玉环玉城街道芦坑村,家里7个兄弟姐妹,一贫如洗的家庭没有条件供他读书。年少时,张文龙最喜欢的就是看戏,台下的他很羡慕台上负责吹拉弹唱的老教师们。

“10来岁的年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家里穷没办法上学,就只想进剧团学习,给人家拉二胡。”张文龙说,“当时找了家剧团,说我一天工钱只要5毛钱就够了,但人家觉得我是个文盲,啥也不会,就把我拒之门外了。”

被拒绝的张文龙很失落,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拉二胡,让剧团对他刮目相看。一把二胡时价几十元,那是张文龙全家一年的生活费。“当时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去山上挖‘草籽球’卖给商贩,饭都吃不饱,根本不可能给我买二胡。”张文龙说。

对二胡的向往在心里一点点“发酵”,张文龙计上心头。他找到剧团,向乐师们讨要了几把坏掉的二胡,带回家就一头扎进屋里,将它们一一“解剖”,研究二胡的构造,摸索着自己做一把二胡。

二胡的琴膜通常用蟒蛇皮制成,玉环当地没有大蟒蛇,张文龙便就地取材,上山抓小青蛇,扒下蛇皮做琴膜,用鸡蛋清做胶水,用竹节做成琴筒……忙活了两三天,张文龙人生中的第一把二胡诞生了,那年他只有16岁。

这把“粗制滥造”的二胡,只能勉强拉出声音,但张文龙视如珍宝,每天在家里拉奏。“我就学着乐师的模样,除了吃饭和睡觉,整天都在拉二胡。”张文龙说。

两个月后,张文龙带着自制的二胡再次来到剧团。剧团负责人被他的精神感动,决定破格录取他。剧团里的二胡老乐师主动指点他,教他看谱、拉二胡,认识二胡,带他入门。

从那时起,张文龙正式与民乐器结缘,一门心思扎进爱好里,开始了修琴大师的养成之路。

自学成才 弹修制样样通

在剧团,跟着戏班子走南闯北之余,张文龙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乐师身旁看他们玩乐器。随着接触到的民乐器种类越来越多,他辨识乐器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琵琶、胡琴、唢呐、鼓、中阮等乐器,一听就能知道好坏。

“乐器演奏都是靠自己摸索,白天我看乐师怎么操作,晚上回家后自己琢磨着练,模仿他们的手法。”久而久之,张文龙学会了二胡、胡琴、琵琶等民乐器的演奏方法,虽不识字却能看谱,成了剧团里的一把好手。

学会了琴,张文龙并不满足。闲暇时,他还是喜欢收集剧团里各种废弃的乐器,带回家拆开研究,知道他喜欢研究乐器,剧团里有人乐器坏了,就会交给张文龙,让他帮忙“治病”。

“刚开始他们也不相信我修好,但我每次拿到坏琴就一个人在那琢磨,修好后送到人家手上,他们的表情都是惊讶的。”张文龙说,慢慢地,剧团里找他修乐器的人越来越多,他都免费帮忙修。

手艺精进了,张文龙开始尝



张文龙：复活乐器

本报记者曹思文 张荣摄



精通各种民乐器的做法



自制的蒙皮工具



平日妻子负责卖乐器,张文龙就一心扑在修复乐器上,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

跟他的乐器都有故事 修一把旧琴 相当于在修复一段美好的过往

试制作乐器。剧团下乡演出到凌晨是常有的事,但收工后不管多晚,张文龙都要钻进自己的小作坊,捣鼓各种乐器。

制作二胡需要蟒蛇皮,当时,玉环县城内买不到,张文龙就到外地去进货,堆在家里颇为吓人;板胡需要椰壳,他就从海南带回几十斤椰子,送给左邻右舍吃,把椰壳收回来;为了做鼓,张文龙去收购牛皮、药水,天冷时就把牛皮搬到山边的水井旁,研究鼓的做法……各种民乐器的做法,样样精通。

如今,小到一吹一唱的巷子,大到二胡琴头上复杂的手工雕花,张文龙皆信手拈来。温州、宁波、绍兴、上海等地的民乐爱好者都会慕名而来,或找他量身定做一把乐器,或是修复心爱的乐器,每天他都停不下来。

匠人匠心 修琴更续情

拆乐器,修乐器,制乐器,张文龙练就了一身真本领。

2006年,结束了20多年的剧团生涯,张文龙在茶堂街开了文龙民族乐器琴行,平日里妻子负责卖乐器,他则一心扑在修琴上。

走进他的小琴行,三面墙壁上挂满了各种乐器,二胡、琵琶、小提琴、唢呐等等。琴行一角,摆放着一张矮桌,上面堆着各式各样的零件、工具。修理乐器,张文龙特别专注,遇到困难自己钻研想办法,自创了多种修理工具。

“像二胡,蒙皮是一道很关键的工艺。蟒蛇皮能不能很好地蒙在琴筒上,很有技术含量。”说话间,张文龙拿出自己设计的一个蒙皮工具,像一个小型的炉子,中间安装了一块圆形的铁网,全靠它降低蒙皮的失败率。

“拿到店里修的琴,大部分都是琴膜破损了。最开始修复琴膜,蒙皮时我一不小心就把皮弄破了,往往修一张琴膜就要损耗好几张皮,成本很高,基本就是亏本给人家修。”张文龙说,手艺人除了手艺,就是工夫值钱,现在他已经能够熟练蒙皮了。凭借着一双“化旧为新”的

巧手,现如今,但凡能说得出口的民乐器,张文龙都能修复。有过人的手艺“加持”,找张文龙修琴的人络绎不绝。

几年前,绍兴的一位民乐爱好者找到了张文龙,他有一把陪伴他多年的二胡,因保管不善不仅琴身斑驳,音色也暗淡无光。“那把二胡买来的价格是2万多元,我花了两三天时间把它修好,基本还原了出厂时的模样,修理费只要了几百元。最后寄回去时,这位先生再三表示感谢。”张文龙笑着说。

一个月前,温岭一位90多岁的乐器爱好者,托人给张文龙送来一把越胡。这是老人家小时候得到的第一把越胡,壮年时为了生活奔波,这把越胡一直被封藏在家中。如今上了年纪,老人想重拾兴趣爱好,可越胡出现不少毛病:皮破了、弦断了,琴身也坑坑洼洼。张文龙潜心修了几天送回,老人家如获至宝,说这就是他年少时的越胡。

这些年,经张文龙手修复的乐器无数。每次他大都只象征性地收几十元的维修费,有的小问题还免费服务。

“每个人跟他的乐器都有故事。对乐友来说,乐器更像是一位陪伴在身边的知音,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修一把旧琴,也相当于在修复一段美好的过往。每当把一把破琴翻新,我心里就被满足感充实着。”张文龙说。

于张文龙而言,乐趣还在于因为乐器他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乐友。乐友上门找他切磋琢磨,是闲暇时最大的快乐。

手记

一门手艺,一辈子的坚守。张文龙把最美好的光阴都交付给了自己的爱好。一个人的能量有多大?张文龙用他的人生解释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天赋和勤奋造就了今天的他。

在我眼中,张文龙就是一个神奇的人,因为喜欢民乐器苦练了一身好本事,也因为喜欢民乐器结识了同行的妻子。妻子懂得张文龙的“喜欢”,一直支持着他,让他毫无顾虑地追逐自己的梦想。

“修乐器真的挣不了几个钱。”采访中,张文龙妻子只说过这么一句带点“抱怨”的话。紧接着,她又说,“张文龙很聪明,任何东西一学就会”,现在能修乐器的人不多,他们不修,这活就没人来干了。

她懂丈夫的执着,所以即使修乐器赚不了钱,也没有要求他改行,而是陪他一起一年又一年做着这件事,过着和睦又平静的生活。

学有所成的人无不经历千锤百炼,其中的苦与甜只有经历者自己知道。在张文龙看来,修复乐器修的不是乐器,更是别人的美好回忆。也许,若干年后,张文龙的小店会跟随他一起“退休”,但他手重新赋予了生命的那些乐器,能继续传递着匠人匠心所带来的温暖。



琴行一角的矮桌上,堆着各式各样的工具。

台州党史 红色故事

台州红色地下交通线的故事

安全撤离党的干部到抗日根据地

李兆建/文

1940年底,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反共,在统治区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搜捕共产党员,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这时期,台属各县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党组织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共产党员被通缉、逮捕和杀害的事件日益增多。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随时有遭到逮捕和杀害的可能。

为了保存党的骨干,积蓄革命力量,1941年8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台属特委建立了一条从三门(1940年7月,三门设县)海游出发,最后辗转到达苏北的地下交通线,部署撤退台属和浙南(温州)、处属(丽水)等地党的干部去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三门海游的恒大糕饼店和下洋村的郑永椿家,就成了台属特委这条红色交通线的起点站。

下洋村三面依山,离大路有七里远,在山岬角落不被注意,是一个进退两便的小山村。下洋村的郑永椿与妹妹郑翠蕉都是地下党员,他们的父亲虽是村里的保长,但同情子女的革命活动,为人厚道,群众关系好。郑家兄妹在村外设有暗哨,在村里依靠红色群众掩护,家里还布置了密室。如浙南特委、省妇委委员陈碧如同志抱病撤退到下洋村,在此隐居养病一个多月,全靠郑家兄妹的照顾。地下党组织在下洋村的各项活动和通讯联络等工作,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因此,台属特委把下洋村看作为一个稳妥可靠的联络点。

转移干部去苏北一般从海游的恒大糕饼店出发,陆路经宁海北乡至宁波,再由宁波乘船去上海;或者直接由下洋村的附近出海,走海上交通线,直抵舟山的沈家门,然后由沈家门乘船去上海。台属共产党组织除了在台属本地设立了多个地下交通联络站外,还派人在宁波、上海、南通等地设立地下交通站。

中共台属特派员临海的地下党员应钧和妻子金若梅在宁波城内县东街租了一处房子,建立交通站,他们负责为撤退的干部办理“良民证”。台属党员胡其清等在上海建立交通站,并成立了由台属特委直接领导的中共上海特别支部,负责撤退干部的接待和转送工作。这个特别支部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华东局驻上海的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人谭启龙的支持。中共台属特委还从仙居抽调党员王瑞清返回家乡南通。王瑞清1939年入党,老家在南通,沦陷后曾在家乡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后去外地谋生。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找王瑞清商量了撤退干部的工作,派王瑞清回到南通尽力利用社会关系,克服困难,并迅速地找到新四军接上了关系,从而在南通建立了由上海转至苏北的地下交通站。将从上海转移去的干部带到新四军苏中交通站,然后由新四军交通站护送到达苏北根据地。

这样,一条由台州三门为起点,经过宁波(或沈家门)、上海、南通等地,最后到达苏北的地下交通线就全线贯通了。

从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台属、浙南(温州)、处属(丽水)等地区100多名党的干部通过这些秘密的交通线,冲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安全地抵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其中有许多是县级以上干部,如李乐山、金良才、丁学渊、丁学精、陈碧如、邵全墨、张子敬、徐道葵等。这批干部的北撤,不仅使党的骨干力量得到保存,而且也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的建设输送了干部。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温州平阳县凤卧乡召开,刘英同志当选为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大会还选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12名代表,其中有中共原台属特委书记郑丹甫和台州天台籍的女共产党员丁魁梅。

刘英原名刘声沐,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凤岗乡(今属象湖镇)竹岗村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4月参加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革命时,就立下了“赤心献革命,决无反顾”的铮铮誓言。1934年7月,刘英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11月任红十军团政委兼政委,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十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是方志敏,参谋长是粟裕。1935年1月,红十军团主力在赣东北的怀玉山区陷入敌人的重围,方志敏等军团主要领导被俘后壮烈牺牲。刘英和粟裕率方志敏命令率领先头部队突围,越过了敌人封锁线,安全抵达闽浙赣根据地,并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取得联系。2月,根据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他们率部进入浙江,在温州、台属与

游击根据地。10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成立,刘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刘英与粟裕在远离中央、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领导闽浙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挺进师编入新四军。1938年3月,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北上抗日,刘英留在了浙江坚持斗争。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任省委书记。同年7月,刘英主持召开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书记。

丁魁梅1916年出生于天台县城东坑边村。童年入丹丘小学读书。1928年进天台中学后,曾多次在中共天台县委机关刊物《赤城》上发表文章。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中共天台县委妇女部长、战时政治工作队第二区区长。7月,调任中共台属特委妇女部长。10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妇委委员,兼任省委机要秘书。1939年7月,当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10月,丁魁梅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结婚。

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先囚永嘉看守所,后转永康方岩。面对敌人的诱降、审讯,刘英坚贞不屈。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由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飭速处决刘英。”5月18日,刘英被敌人秘密枪杀于浙江永康县方岩山中,牺牲时年仅37岁。

1942年2月8日刘英在温州被捕时,丁魁梅已经怀孕,她强忍悲痛,立即处理掉文件、密码,由温州启程来到台州,先在温岭县冠城乡念姆洋村浙东南地下交通站负责人赵任的家里。在那里,丁魁梅向全省特委发出了“技术信”,告知刘英“病危,不能自由行动”,将刘英被捕的消息急告各特委书记。

赵任是1926年入党的地下党员,曾任中共温岭县委委员。抗战时期,他以国民党冠城乡乡长职务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活动。1938年中共台属特委成立后,丁学精分管武装工作,常住在赵任家,认为冠城的武装工作很有成绩,把他作为台州的一个武装工作点。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台属军委书记陈卓来到温岭冠城指导工作,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成绩,把赵任提拔为台属军委委员。在此期间,根据刘英批示,中共台属特委决定在赵任家建立浙东南交通联络站,负责联络台属特委与驻温州省委之间的联系,由赵任担任站长。赵任在负责交通站的工作中,先后接待了省委、特委领导刘英、粟裕、陈卓、丁魁梅、刘清扬、丁学精、王琳芳、林尧、陈绍裘、罗毅等人。

怀有身孕的丁魁梅拖着疲惫身体躲避到赵任的交通站,得到了赵任的热情接待和全力保护。他积极配合了丁魁梅的工作,把丁魁梅通知各地特委注意隐蔽的信件,通过多种渠道迅速安全送出去,使各地的党组织未遭受损失,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还精心安排,将丁魁梅转移到三门的恒大糕饼店。

丁魁梅藏身恒大糕饼店三个月,由店主人叶招妹精心安排生活。章彩香、章夏渠姐妹将丁魁梅安排在专住房间,饮食也送到房内吃。除了恒大糕饼店母女三人和台属特委领导郑嘉治可以看望她,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可见其保密工作做得何等细致。

三个月后,丁魁梅由台属特派员秘书林尧护送安全地抵达上海。到上海后不久,他们通过胡其清在上海特别支部的关系,和中共华中局驻上海联络站取得了联系。

当时,皖南事变以后,闽浙皖赣四省的党组织先后和华中局失去联系,谭启龙同志受华中局的委派,负责上海联络站,秘密地取得上海市委刘尧、沙文汉的协助,寻找线索,以便打通与闽浙皖赣四省党组织的联络。此时,直接联络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杨斌,首先接上了林尧的关系,沟通了和台属特委的联系,知道台属特委在上海的特别支部的任务,并经特别支部通知浙江省委委员、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到上海听取汇报,传达了华中局对浙江省委的工作指示。

这时,上海地下党也在撤退党员干部去苏北参加新四军。由于环境复杂,路途交通的困难,无法确定丁魁梅同志在上海的行止。杨斌请示了谭启龙同志,并约定林尧同志在大西路(延安西路)上和谭启龙会面,从而取得了谭启龙同志的领导,直接联系和安排了丁魁梅同志的组织关系。之后,丁魁梅安全转移至苏北抗日根据地。

后来,丁魁梅先后任中共中央分局组织干事、组织科长、第三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政治组副科长、华东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干部科科长等职。丁魁梅腹中的孩子,就是改革开放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总书记的刘锡荣。